

文学的良心

□邢庆杰

1989年的秋天,我站在空旷的田野中,为一片葱郁的玉米愁肠百结。当时,我并没有想到,正是这一片让我不知所措的玉米,让我写出了小小说的成名作,从一个无名作者走进了小小说的殿堂,从而引领我在文学这条路上渐行渐远。

我是1989年春天被招聘到老家所在的那个乡政府的,做专职新闻报道员。那时,我已经初中毕业4年,并在家一边务农一边舞文弄墨4年了,有几篇豆腐块文章变成地区党报的铅字。那年月,一个青年农民在没有任何背景的情况下,想在乡政府谋个差事,是很不容易的。进了乡政府,不但不能领到一份补贴,家里有些事如顶河工、批宅基之类的事也好办。还有一条,很快就能成为“名人”,那时候村里没电话,乡政府想找谁,就在广播里喊,这一喊,全乡76个自然村都能无缝覆盖。在乡政府的那段日子,我在责任田里干活,有时候就听到广播里喊我的名字,我扔下手里的农具,骑上自行车就往乡里赶。

1989年的秋天,乡政府决定搞“麦棉套种”,因为这种新的种植法很多农民不理解,也掌握不了,配合不是很积极,乡里就在重点村成立了秋种指挥部,安排人员一天24小时值班,说是指导种植,还起到监督的作用。我和乡文化站站长老吕、乡广播站的小吴,被安排在指挥部日夜轮流值班。所谓的“指挥部”,就是在庄稼地里,找了一个靠水的地方搭起的帐篷。为了方便宣传,在指挥部的门口还安装了广播喇叭。离村远,接不上电,就把电影队的放映员小王也派了过来,专门给我们发电。为了安排好我们的生活,还把水利站上的厨师派给了我们,专门给我们做饭。白天的时候,乡农技站的几个农技员也常过来,在附近的庄稼地里转一转。但她们不值班,天一黑就回家了。